

抗日战争中在四川病逝和遇难的剧人影人

孙晓芬

在抗日战争中，我国南北的著名戏剧界人士荟萃重庆，与四川本地的戏剧工作者相汇合，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以戏剧为有力武器，从事于民族存亡的斗争。但是，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统治下，特别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在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审查的文纲与演出的重课税双把利剪，使影人剧人生活无保障，人身无保障，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顽强地斗争着。有的穷困而死，有的积劳成疾而倒下，有的以自己年轻的生命为抗战戏剧捐躯，还有的被日寇、被法西斯特务残酷杀害。

一、为抗敌戏剧而捐躯的剧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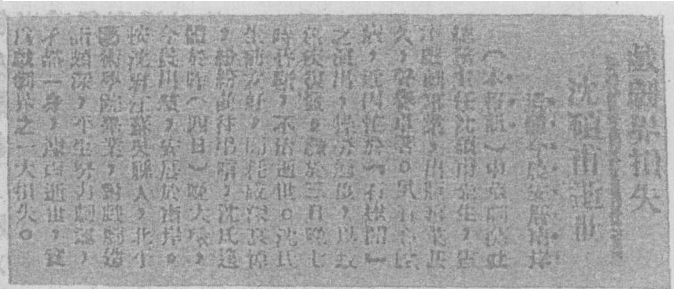
青年艺术家刘鸣寂（1919—1939），四川巴县人，他是我省早期从事于版画艺术的木刻工作者之一。1937年初，与鄂中铁等一起组织重庆木刻研究会。抗战爆发后，他是重庆文化救亡协会戏剧队的主要成员之一。1939年2月，率重庆市业余剧团赴长寿宣传公演。公演的舞台台面高出地面一米多，这是四川常见的“万年台”。20日，在长寿的一个场镇演出时，刘鸣寂因劳累过度，失足坠于舞台下后脑重伤，抢救无效，于21日身亡，年仅20岁。临危时他还鼓励大家坚持演出。据《新蜀报》1939年2月24日关于《刘鸣寂君逝世》之消息报道述：“闻本市育德女学、启明小学、青年职业互助会移动剧团、儿童演剧队、全国剧协渝分会等团体，正筹备举行追悼及善后募捐”。该报于3月17日之“文锋”副刊就刘鸣寂因公殉职发了《刘鸣寂追悼会启事》，追悼会于3月18日（星期六）午后在社交会堂举行。并发表了两篇悼念文章：金满成的《悼刘鸣寂》，戈浪的《哭刘鸣寂同志》。刘鸣寂用他年轻的生命，为抗战戏剧宣传、为在农村普及话剧，写下了感人的篇章。

二、在日寇铁蹄下遇难的四位电影界工作人员

1940年7月7日，《国民公报》的“电影战线”第43期，刊载了“追悼电影界殉职工作人员特辑”，（图一），即追悼吕奎文、山本熏、赵云泉、张顺德四位国籍不同的电影工作者。他们死的形式不同，但都是死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之下。

中国电影制片厂于1940年7月6日举行追悼会，纪念于1939年7月6日在日机轰炸重庆殉难的吕奎文同志，他为该厂之主任秘书。刘念渠、史东山皆著文悼念，称他是一位电影战线上的优秀干部。

山本熏（1907—1941），为日本大阪市籍人。中日战争爆发后，隶属侵华之“矶谷刘团”部，充任陆军军曹长。于1937年在江苏合州向我军投城，入收容所后，经我方优容劝导和感化，甚觉日本军阀侵华之非义，故组织日本反战同盟筹备会，向日本人民作反战宣传。1941年3月，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影片《东亚之光》开拍，山本熏所在的收容所组织“日本反战同志派遣团”，由沈起予率领到“中电”参加工作。山本熏在《东亚之光》中担任重要角色，他工作热心，表演深刻细致。有一天因为突发牙齿剧烈肿痛，送至宽仁医院后，经医生精心医治，终发现其病系日寇在作战时为荼毒我战区同胞而发放之毒品所致，百般医治无效，于同年3月15日逝世。《国民公报》在追悼特辑中说，山本熏君死于日本军阀侵略军之手，在《东亚之光》一片工作中途而故，使人倍觉恻然。



图一	图三
	图二
	图四



赵云泉（1918——1941）和张顺德（1906——1941）皆为“中电”的工友。赵氏是浙江镇海人，八岁父母双亡，托养于亲戚处。成人后习电业于上海。抗战开始在汉口市电灯公司服务，武汉撤退时到渝，在市电料行一所工作，经人介绍到“中电”任电工，1941年5月28日，因日机轰炸重庆，他来不及避入防空洞而被炸身死。张顺德为江西人，在汉口加入“中电”当工友，在厂工作六年余，5月28日外出，敌机轰炸时遇难。

三、在贫病中为抗敌戏剧而献身的剧人影人

沈硕甫（1903——1943）江苏吴县人。早年毕业于北平艺术学院，对戏剧造诣颇深，抗日战争时期到四川，多年从事戏剧事业和出版事业，并任中华剧艺社总务主任、群益出版社经理，声誉卓著。孑然一身，为抗战剧运奔走，抱病操劳。中华剧艺社先在重庆南岸黄桷垭的苦竹林为社址，剧艺社的同志们睡稻草铺，吃饭有时接不上顿。沈硕甫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为中华剧艺社的演出组织工作而奔走。他要帮助社长筹资联系肯借钱和募捐给剧社的个人和单位，要找演出场地，当戏开演前后，他要应付军警的弹压和仗势者、流氓的挑衅，尽力保证每台戏能够顺利演出。沈硕甫患有心脏病，长期抱病工作。1941年4月初，剧社上演《石达开》，终经沈硕甫各方奔走得在“一川”戏院公演。4月3日首演，沈硕甫却在临江门坡梯上昏厥倒下，因心脏病突发而逝世。（图二）中华剧艺社的演员们强忍悲痛终将《石达开》的首场坚持演完，当他们看到受人尊敬的沈大哥与世长辞了，无不悲恸已极。入殓时打开沈硕甫的外衣裤，内面的衬衣衬裤破烂得无法再补了。中华剧艺社无钱买地埋葬这位死在战斗岗位上的剧人，还是作家刘盛亚捐了一块在南岸的墓地，才安葬了的。当中华剧艺社为沈硕甫出殡时，送葬的队伍越来越长，无形中成为了重庆进步文化界和进步人士的一次示威游行。《新华日报》于4月5日发出沈硕甫逝世的消息，（图三）8日举行追悼会，由郭沫若致悼词。《戏剧月报》第一卷三期发表《悼沈硕甫》一文。

沈西苓（1903——1940）原名沈学诚，笔名叶沉。浙江德清人。是我国三十年代著名的电影艺术家、戏剧导演。他早年在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学习，毕业后公费留学日本，在

东京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他对话剧很感兴趣，结识日本戏剧家秋天雨雀等人。1924年，开始在日本筑地小剧场实习美工。回国后投入左翼文艺运动，1928年参加了创造社，在上海美专和中华艺术大学执教。他先后参加“艺术剧社”、“时代美术社”。1930年以鲁迅为首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沈西苓为发起人之一。1933年按党指示作为第一批左翼作家参加明星公司，连续编导了《女性的呐喊》、《上海廿四小时》、《乡愁》、《船家女》、《十字街头》等影片，其代表作《十字街头》是我国电影发展史上的优秀影片。1937年起积极从事国防戏剧运动，参与创作《撤退赵家庄》，导演了《武则天》、《醉生梦死》等话剧，创作了《在烽火中》、《罗店血战》等独幕话剧。1937年在“八·一三”的炮火中，上前线参加战地新闻片拍摄工作。1938年1月，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沈西苓当选为理事，并于该年春到四川，参与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在重庆、成都广为演出。是年，被中央电影制片厂聘为特约编导，接着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任编导委员。1939年9月完成了反战影片《中华儿女》。沈西苓还先后在成都和重庆导演了《民族万岁》、《塞上风云》和《一年间》等话剧，并写了电影剧本《大时代的小人物》（取材于无名英雄战斗事迹），不幸影片尚未开拍，竟患伤寒病，于1940年12月17日病逝于重庆，年仅36岁。（图四）正当年富力强、才华横溢之时去世，甚为可惜。1941年12月17日，重庆戏剧界为沈西苓逝世一周年举行纪念会，郭沫若在纪念会上说：“我们要纪念西苓，完成西苓未竟的志愿，首先要为西苓报仇，消灭法西斯侵略者”。

江村（1914—1944）原名江蕴端，江苏南通人。（图五）江村为南京国立剧校的高材生，抗战初年辗转湘鄂之间，1938年入川，先后在上海业余剧人协会（职业剧团）、“中国胜利剧社”、“中央青年剧社”等社团演出进步话剧，为优秀的青年演员。先后演出了《太平天国》、《阿Q正传》、《夜上海》、《雾重庆》、《大雷雨》、《棠棣之花》、《蜕变》、《大明英烈传》等剧。并参加中央电影摄影厂和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拍摄工作，（图六）在电影《白云故乡》中崭露头角，曾为广播电台导演过《黄金时代》，在舞台上和银幕上扮演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古今人物。他不仅是一个好演员，还是一个诗人，写了不少诗文。在贫困的生活中，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肺结核侵蚀了他的弱体。1944年3月离渝赴蓉，因故未能演出《北京人》，他一气之下，加剧了病情的恶化，在文学界戏剧界友人的帮助下，住进了四川传染病医院。但生活十分拮据，在贫

病交迫中，于5月23日病逝医院。他在内地没有亲属，病中药费全靠剧人友人筹助。他在成都住院期间，中国胜利剧社在渝演出阳翰笙的《两面人》，上座甚佳，剧社以演出所得款之一部份捐助江村医药费一万元，突闻他的噩耗，以此一万元捐款为他的丧葬费，将遗体安埋成都。丧事由顾而已、陈白尘主持。据老报人车辐回忆：“安葬的那天下着雨，朋友们都冒雨前往医院为他举行追悼仪式，参加会的有顾而已、陈白尘、王东生，以及文艺界、“中艺”、《华西晚报》、《华西日报》的朋友三、四十人。送葬到墓地的有顾而已、王东生和我，我记得坟筑好后，顾而已掏出手枪向着风雨凄凄的天空连放了两枪，以示哀悼和抗议。”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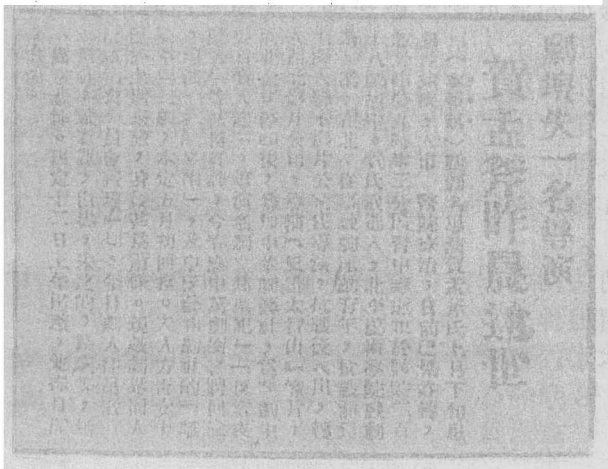
图五、江村遗照（车辐珍藏）

图六、施超（前排右数第二人）、江村（前排左数第二人）参加中央电影摄影场为前方将士募集寒衣公演（车辐珍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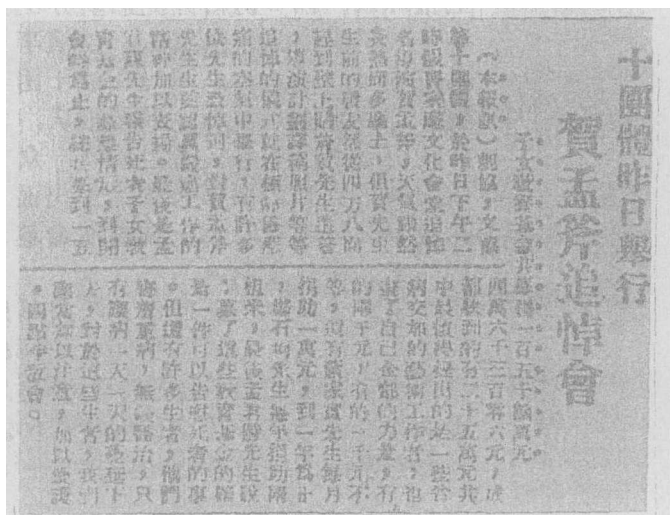


那时无钱买墓地，还是车辐赠其老母的半亩墓地，该墓地在成都外东包家桥侧南冲大堰（即外东琉璃厂李家大堰），江村的遗体才得有安埋之所。江村逝世后，陈白尘请郭沫若为墓碑题写了碑文，《华西晚报》1944年5月30日载：“郭沫若为故剧人江村墓碑题字，昨（二十九日）已寄到成都，碑文为‘剧人江村君之墓’，下署‘故人生于一九一四，殁于一九四四’”。舞台美术家姚宗汉设计了墓穴墓碑图样。《新华日报》于1944年5月26日在第3版发消息“渝剧人筹备追悼江村”，该报于5月29日、30日连续在第4版上分别发表署名悼念文章有：孙宗明写的《哀江村》，周峰写的《悼念江村》。《新华日报》于6月3日第3版的“成都近闻”中，说“剧人江村之死，据说最大原因是穷”。

施超（1913—1944）原籍福建，生长于北京，为著名话剧电影演员。他于1933年到上海参加进步影剧活动，1934年参加上海电通影片公司，主演了名片《自由神》后，又在新华公司拍摄的《狂欢之夜》、《夜半歌声》、《青年进行曲》、《壮志凌云》等片里扮演主角，特别是《夜半歌声》影响最大。抗战爆发后，施超加入首批入川话剧团“上海影人剧团”于1937年10月15日即抵重庆，以后加入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华剧艺社”等职业话剧团，活跃于四川剧坛之上。先后在重庆、成都等地演出了《芦沟桥之战》、《流民三千万》、《放下你的鞭子》、《全民总动员》、《黑地狱》、《阿Q正传》、《上海屋檐下》、《一年间》、《塞上风云》、《屈原》、《孤岛一女郎》等，导演过《醉生梦死》、《求婚》、《雷雨》等戏。他还在重庆主演了抗日影片《中华儿女》、《长空万里》。他参加了中央青年剧社演出历史剧《清宫外史》，任过话剧《武则天》的舞台监督。1944年秋在成都主演《大明英烈传》，因劳累过度，使原患的肺结核病骤然恶化，当《大明英烈传》上演第三天，演至第三幕即呕血而辍演，不久住进了四川省传染病医院，在其妻路曦的照顾下条件比江村略好一些。不久路曦因住院费和生活所迫，离开他参加巡回演出。“文协”成都分会得总会指示，发起救助贫病作家的募捐运动，“分会”几次给施超援助医药费，文学戏剧界的朋友送去营养品。但施超不幸于10月26日辞世。《新华日报》于10月28日第3版报道“剧人施超病歿成都”。据当时《新民报》报道：施超丧事由陶镜寰，应云卫和陈白尘主持，决定葬“外东包家桥侧，与诗人江村比穴，地均为友人车辐赠”。在乐山演出的路曦赶回奔丧，因车阻直至10月30日才抵蓉，施超的安葬在11月2日举行。文学戏剧界数百人在医院举行了追悼仪式，百余人冒秋雨送葬，穿城直到天福桥外。据当事人车辐回忆：“虽然没有仪仗、鼓乐和鞭炮，但气氛极其悲壮，实际上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摧残作家剧人的一次抗议和示威。记得送葬到墓地的有路曦、金淑芝、陶镜寰和我，路曦和金淑芝坐鸡公车^②，我和陶镜寰步行”。据车辐回忆，“施超与江村合葬后，陈白尘又请郭沫若题了碑文，请姚宗汉设计了墓穴墓碑图，郭沫若题的碑文为：‘剧工施超 诗人江村 君之墓’”。墓碑由车辐经手建造，在1米高的红沙石墓碑上刻有郭沫若的手迹。可惜这块具有文物价值的碑石在“大跃进”时被挖，后来连坟墓也难以寻觅了。



△图七



图八▷

彭波(1911—1944),第一个安葬在包家桥侧南冲大堰车辐母亲坟地里的剧人。她是中华剧艺社的职员,任保管工作。由于物价飞涨、生活艰辛,她患肺病未能及时得到医治,营养奇缺,且在产后患了黄疸病,病上加病,不幸于1944年3月20日在成都公立医院病逝。“中艺”和彭波的丈夫沙风无钱买坟地,幸遇老报人车辐仗义相帮,才幸免埋尸乱坟,得于3月27日下午入土安葬遗体。

贺孟斧(?—1945),河北武进人,著名导演。早年毕业于北平艺术学院戏剧系,抗日战争前从事戏剧电影工作多年,在上海联华影片公司任导演。抗战后首批入川,转入西北影片公司,导演了《风雪太行山》等影片。先后在“上海影人剧团”、“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华剧艺社”执导,并任中华剧艺社理事。导演了《愁城记》、《风雪夜归人》、《离离草》等进步话剧,在话剧导演和舞台美术设计方面皆有建树。1940年5月,他翻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我的艺术生活》由群众出版社出版。1945年春,应中国万岁剧团之聘,回渝导演《梭梭风雨》,并导演中华剧艺社的《离离草》。4月下旬患恶性疟疾,入医院治疗,已见好转,忽于5月10日晨9时因肾中毒逝世于医院。(图七)5月12日出殡,重庆的编、导、演员和舞台工作人员皆参加送殡,有的观众也自动参加。6月28日下午,中华全国文协、中华全国剧协、中华剧艺社、中国艺术剧社、中国万岁剧团、中电剧团、中央青年剧社、怒吼剧社等十团体,在重庆文化会堂举行贺孟斧追悼会,(图八)在追悼会上展览了他的遗著、导演计划、译稿和照片等。贺孟斧身后甚为萧条,其妻方菁女士到重庆。成都、重庆和昆明各地募集贺孟斧子女教育基金。贺氏生前甚为关心学生的话剧活动,成都十个大学生剧团为纪念他的不幸逝世,在“成都文协”的关怀下,由中华剧艺社全力支持,应云卫任导演,排演《上海屋檐下》,以“成都大学生剧团为纪念贺孟斧先生联合公演”之名,计演二十余场④,有十个左右大学生剧团参加,如:燕京大学的“海燕剧团”、四川大学的“剧艺社”、“话剧团”、“研究社”,华西大学的“天竺剧社”、光华大学的“光华话剧团”以及华西坝五大学的“学生公社剧团”等。

四、国民党特务制造的杀害剧人的最大惨案——“綦江惨案”

在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进步作家随时都有进集中营的危险。有的剧人出于爱国,演了进步话剧,而遭监禁,而遭杀身之祸。骇人听闻的“綦江惨案”,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事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所属“忠诚剧团”的部份青年热爱抗日爱国的话剧,为了排演好阳翰笙的历史剧《李秀成之死》,与重庆戏剧界进步人士有所交往,“并特请戏剧家马彦祥导演该剧。1940年初,赴渝公演《李秀成之死》,(图九)李英主演李秀成。特务机关密报战干团教育长桂水清,说《李秀成之死》是宣传共产主义,还说忠诚剧团中有共产党组织,并上报陈诚,以《防治异党活动办法》立即下令镇压。忠诚剧团返回綦江后,遭到特务头子滕杰的残酷镇压,扮演李秀成的演员李英被活埋,其他参加演出的二十几位青年被枪杀⑤,同时在战干团的五千余人员中清理共产党,被关押者不计其数,饰演忠娘的女学生逃至重庆,向阳翰笙、陶行知等进步知名人士控诉这一惨案,引起重庆各界人士之愤慨,众论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一罪恶行径,由新上任的国民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出面处理,才将被关押人员释放,但致伤致残者竟达数十人。⑥当时章士钊愤然命笔作诗,呼吁:“自古奇冤多,大者綦江狱”。

五、病故之剧人

朱双云(?—1942)我国早期话剧剧作家、戏剧史家。于1942年3月31日不幸在渝病逝,《戏剧新闻》出特辑追悼朱双云,并介绍其生平、著作。

姚宗汉(?—1945)舞台美术家。他曾在1944年两次为江村和施超设计墓穴墓碑,1945年8月下旬病逝重庆。8月29日,重庆戏剧界人士公祭姚宗汉。他生前曾设计了抗敌名剧《陌上秋》、《离离草》、《春寒》等。

(本文图片除署名者外,为乔大鸣摄)



我党在民族地区颁发的第一个宗教法规

周锡银

伟大的红军长征，已经以其雄伟壮阔的画幅、气壮山河的旋律载入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辉史册。由于长征的英雄们坚定地执行了党的政治、军事路线和民族、统战、宗教政策，因而得以纵横驰骋于黔、滇、川、康、甘、青、陕等省区的辽阔地域，越过了苗、瑶、壮、侗、布依、土家、纳西、白、彝、藏、羌、回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打退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截堵，翻过了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胜利地完成了举世无双的战略大转移。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笔者借此机会将长征时期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及在民族地区颁发的第一个宗教政策法规作一简略的介绍。

一、长征时期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主张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早在1923年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关于党的任务中就指出：“实行义务教育，教育与宗教绝对分离”。^①1926年9月，中共四届（扩大）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民运动议决案》、《对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学生运动议决案》以及《关于济难运动的议决案》等，都强调了党对宗教要持慎重态度；规定：不要故意造出一个与他们发生实际的冲突的机会；不要积极地去反对迷信教条；为了团结组织各种反帝爱国力量，革命活动应不分党派、宗教、阶级等等。^②

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更进一步明确指出了党对宗教的态度和政策。他说：迷信观念之破除，“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③到1934年6月16日，红军长征前夕，以夏曦、关向应、贺龙、卢冬生署名颁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中亦着重强调：“信教自由，保护神坛和不信神者的自由。”^④

长征开始后，红军陆续进入社会历史情况都比较复杂，宗教信仰特别深厚的民族聚居地区。当时，藏族、白族信仰佛教；回族信仰伊斯兰教；苗、瑶、彝、羌及纳西、土家等族大多保持比较原始的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部分人则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这就给了党和红军以实践并逐步完善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极好机会。红军宣布和遵循的有关宗教政策的主要内容有：

“回、番民族宗教信仰自由”，“念经敬佛、当喇嘛听其自愿”，“准许人民信菩萨，不愿当喇嘛的准许还俗”，“反对伤害

注解：

①刘传辉：《一杯黄土缕缕情怀——访抗日时期为外省三剧人献墓地的车辐先生》，《重庆剧讯》1985年第1期。

②川西平原上一种木制的手推独轮车，可运载谷米副食，也可坐人。

③《剧坛失一名导演——贺孟斧昨晨逝世》，《新华日报》1945年5月11日。

④任耕：《回忆〈上海屋檐下〉在成都》，《抗战文艺研究》1982年第3期。

⑤陈美英、季滨、窦晓红：《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话剧活动大事记》，《抗战文艺研究》1983年第5期。

⑥石曼：《〈李秀成之死〉和綦江惨案》，《四川日报》1985年4月3日。